

叶君远
著

清代诗坛第一家

——吴梅村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清代诗坛第一家

——吴梅村研究

叶君远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诗坛第一家:吴梅村研究/叶君远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101-03426-8

I . 清… II . 叶… III . 吴梅村 - 人物研究
IV .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8234 号

责任编辑: 俞国林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清代诗坛第一家

——吴梅村研究

叶君远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7 1/4 印张 · 169 千字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册 定价: 14.00 元

ISBN 7-101-03426-8/K · 1474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总 序

这套丛书奉献给读者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近年来取得的部分新成果。

我们教研室包含三个研究方向:古代文论一个方向;古代文学两个方向,一是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一是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古代文论单独一个方向,是研究对象有别;而古代文学内部的两个方向,则是研究方法和旨趣的不同。前者着重于材料的搜索与考辨,个案的审察与解析;后者着重于义蕴的探求与阐发,脉络的清理与贯通。用古人的话说,前者旨在“照隅隙”,后者旨在“观衢路”。这两种方法和旨趣的不同在古代文论研究中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因为人员较少不便分开罢了。

然则,上述两种方法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当求两全齐美,何可分而治之耶?此言极是。无论研究古代文学还是古代文论,其立足之根基都是文献考索与个案解析。“隅隙”皆暗,“衢路”何观?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也。而无论古代文学还是古代文论,其精深之义蕴又都在产生它们的传统文化之中。俯首“隅隙”,何观“衢路”?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也。然则,理虽如此,事或多端。即使皆以两全齐美为标的,实际做下来也会各有偏长,各有侧重。此乃“情性所铄,陶染所凝”,自然而然者也。因其

1986.10

自然之势而分之,可使各骋所长,各成其美。与其“汉”“宋”相抵,何如“汉”“宋”并峙?

姚鼐论文之阴阳刚柔,有曰:“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上述两种研究方法之关系,似亦近于此。考据与义理糅而兼胜,固历来大家之风范,我辈景仰之余,当竭力逸之。“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自当着意免之。至如“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既无醒目之新材料,亦无迈往之新见解,文献考索与文化分析两不相涉,唯以时髦之“话语”餍人者,尤当尽力绝之也。

现在出版的这套丛书,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旨趣。其瑜瑕得失,恭请学界同人与广大读者评判。对于这套丛书的出版,人大中文系与中华书局都给予了热诚的帮助。感激之余,我们将更加努力地工作,争取以更好的成果答谢他们的厚意。

前 言

清人舒位所撰《乾嘉诗坛点将录》和民国时汪辟疆所撰《光宣诗坛点将录》，仿照梁山好汉排座次的方式，分别给乾隆、嘉庆和光绪、宣统两个时期的诗人排了排队，谁为威风八面的主帅，谁为雄踞一方的裨将，谁是武艺超群的头目，谁是技艺平平的喽罗，谁当排在哪一行列，谁当归入哪一营阵，一一交代清楚，好像一支一脉都历历在目的谱牒，并且在每位诗人名下，还注明了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套路，表现出什么样的风格。且不管舒位和汪辟疆的评点是否准确恰当，这种方式却很新鲜，也挺好玩。

由此不由让人想到，倘若将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的所有诗人排排座次，谁有资格坐上第一把交椅？当然，如果众人来投票，见仁见智，恐难统一。但我却毫不犹豫地推举吴梅村。为什么？理由有三：

第一，辈分高。吴梅村是清朝第一代大诗人，顺治十年前，就已经成为诗坛宗主，而“名满区域”了。

第二，贡献大。一个诗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归根结底是由他是否对诗歌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决定的。吴梅村之所以杰出，就是因为他做出了这种独特贡献。其贡献一在叙事诗上。我国古代，叙事诗虽然一直不绝如缕地发展着，但是始终数量不多，难以和抒情诗相提并论。在叙事诗发展的长链上，吴梅村的创作无疑是十分光辉夺目的一环。以往还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写过像他那样

多的以重大时事为题材的叙事诗，白居易比不上，杜甫也比不上。并且他在这一领域的佳作之多在历史上也属罕见。其贡献之二在诗体上。古典诗体（不包括词曲）到唐代就已经齐备，在体裁形式上留给后世能够推陈出新、自成面目的余地已经很小，很少有谁在这方面施展身手，大有作为。可是，吴梅村却独在七言歌行上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块领地。经过他的多方取法与精心锤炼，七言歌行这种诗体更加谐婉，更加流动。其《永和宫词》、《圆圆曲》、《萧史青门曲》、《鸳湖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等都成了这种诗体的典范之作，它们和历史上存在过的歌行都不相同了，人们因此呼之为“梅村体”。遍检清代诗人，有资格将其名号加在某种诗体之上而称为“某某体”的，能有几人？

第三，影响深远。清代个人成就很高或名气很大的诗人颇有几家，可是有的偏守一隅，影响不能广被其他地区；有的在世时轰动一时，身后影响却大大“缩水”；有的是靠诗论大张其帜，其创作却不能久诵于人口；有的则是诗文集遭到当局严厉禁毁，后人只闻其名，难见其诗……而吴梅村的影响却广大而悠远，且不说当时就有多少钦慕者与追随者，后世喜爱吴诗者也是代不乏人。我们只举三例：龚自珍在《〈三别好诗〉序》中说自己对吴诗“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以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吴诗出口授，故允缠绵于心”。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论及吴诗时说：“余偏嗜之，常推为云门嫡嗣外一大宗。”近代学者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晚读吴梅村《长平公主诀》（按当为《思陵长公主挽诗》），泪下不止。宓素爱顾亭林与吴梅村之诗，近年益甚，盖感情深同耳。”^①以上三位大文豪、大学者都受到过吴诗的濡染与启迪，该是很有代表性的。

综合以上原因，而把吴梅村推为“清代诗人第一家”，我认为，

应该是站得住脚的。其实,就是把吴梅村放到唐代或宋代,也绝不会输给那些一流或准一流的诗人。

可是,要是说起被研究者重视的程度和普通读者熟悉的程度来,吴梅村可就大大丢分了,“门前冷落车马稀”,关注者寥寥,对他的研究甚至赶不上唐宋二三流诗人。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同人们普遍具有的“贵远而贱近”的心理有关;也同清代诗歌已经输给小说戏曲,滑落为边缘性文体,因而从整体上受到轻视有关(这主要是就研究界而言的)。

笔者自从接触吴梅村的诗歌,就由衷地喜欢上了它,也做过一些研究。已经出版过的几本著作连同这本书,自知浅陋,权当作引玉之砖吧,殷切地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学人对这位清朝诗坛一代大家的重视,有更多真正有分量的研究专著出现。

注释:

- ①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所引《雨僧日记》。

目 录

前 言	1
吴伟业生平考辨	1
吴梅村应召仕清之际心态探微	21
论吴梅村仕清后的政治态度	37
浅论吴梅村的诗文观	51
重新审视吴梅村的早期诗歌	64
论“梅村体”	78
略论吴梅村的戏曲理论与戏曲创作	94
娄东诗派与吴梅村	102
《鹿樵纪闻》辨伪	110
《绥寇纪略》考论	122
也论《圆圆曲》——与姚雪垠先生商榷	130
千古绝唱《圆圆曲》	146
《鸳湖曲》辨析	157
吴梅村部分七言歌行作期考	167
吴梅村的一首重要佚诗	179
吴梅村佚诗辑考	187
吴伟业佚文辑考	203
参考书要目	231

吴伟业生平考辨

吴伟业是明末清初卓有成就的诗人,过去很长时间,对他研究得很不够。最近十几年,情况有所改变,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文章大为增加,这使得吴伟业研究大大深入了一步。

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目前的研究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缺点,即在谈及吴伟业生平时,往往为旧说所囿,真伪莫辨,正误间出。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对这位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都十分复杂的诗人的正确认识与评价,不能不影响到对其作品的正确理解与分析。因此,对有关吴伟业生平的史料,实有加以辨别真伪正误的必要。

关于吴伟业生平的史料,常常引用到的比较重要的有下列几种:顾湄的《吴梅村先生行状》、陈廷敬的《吴梅村先生墓表》以及顾师轼、铃木虎雄和马导源的三种《吴梅村年谱》。

顾湄的《行状》撰写于康熙十二年七月,其时距吴伟业去世不过一年多,而顾湄又是吴伟业的亲授弟子,他自称:“从先生游者垂二十年,受先生之教为深。”^①因此,除去吴伟业本人的作品,他的《行状》应该说是关于吴伟业生平的最原始可靠的材料了。陈廷敬的《墓表》是在康熙四十五年冬受吴伟业的长子吴曛的委托而撰写的,其时距吴伟业去世也不算久,而且必然经吴曛过目,所以,《墓表》按说也当是比较靠得住的材料。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会发

现,以上两种史料已然有误,尤其是陈廷敬的《墓表》谬误更多。此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缺憾,就是太简略了,要想详尽地了解吴伟业的生平事迹,窥探其思想演化的过程,依靠这种粗线条的记述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有关一个人生平最详备的材料是年谱,在上面所说的三种《吴梅村年谱》中,以顾师轼的为最早。顾《谱》编纂于清道光十二年至十九年,顾氏依据康熙七年镌板印行的四十卷本之《梅村集》,参以靳荣藩的《吴诗集览》、程穆衡的《吴梅村编年诗笺注》、吴翌凤的《吴梅村诗集笺注》等吴诗注本以及其他一些史籍,对吴伟业的事迹、作品,凡有年月可稽者,一一“厘次先后”“编年比附”^②,确有开创之功。可是,该《谱》错误较多,或者是事迹先后舛错,或者是诗文系年有差。另外,由于顾师轼未能见到清末才发现刊行的五十八卷本之《梅村家藏稿》,故其《谱》又不可避免地有许多疏漏。

针对顾《谱》的上述缺失,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于一九二八年(日本昭和三年)重新撰写了《吴梅村年谱》,对顾《谱》做了一番纠谬补阙的工作。遗憾的是,该《谱》所参用的史料不多,除去《梅村家藏稿》,基本上没有超出顾《谱》的范围。而《梅村家藏稿》中的材料,又没有加以充分的利用。因此,它未能纠正顾《谱》的全部谬误,许多顾《谱》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它也照样含糊不清,而且,它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错误。

马导源的《吴梅村年谱》在绪言中提到曾参考了“日本铃木虎雄氏对梅村先生之考证”,可见成于铃木虎雄《吴梅村年谱》之后。我把它同铃木氏《谱》逐字逐句对照看过,发现除极个别字句不同外,完全是对铃木氏《谱》赤裸裸的抄袭。所谓三种《吴梅村年谱》实际上只是顾师轼和铃木虎雄这两种。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就吴伟业生平中一些比较重要而尚未搞

清的问题作一番考辨,纠正上述材料中的谬误,避免继续以讹传讹,同时,弥补上述材料中的疏漏,以便更全面、更清晰地反映出吴伟业生活和思想发展的轮廓来。

一、“奉使封藩”和任南京国子监司业的时间

“奉使封藩”和任南京国子监司业是吴伟业在崇祯朝很重要的两段经历,关于这两段经历的时间,众说不一。综观旧说,大体有如下三种意见:

1、这两段经历都发生在崇祯九年之前,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在先,“奉使封藩”在后。此说出陈廷敬《吴梅村先生墓表》:“……顷之,迁南京国子监司业……旋奉使河南封藩。丙子,典试湖广,当时号得士。”按“丙子”为崇祯九年。

2、这两段经历都在崇祯十二年,也是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在先,“奉使封藩”在后。顾师轼和铃木虎雄的《吴梅村年谱》皆主此说。

3、这两段经历都在崇祯十二年,不过,是“奉使封藩”在先,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在后。顾湄的《吴梅村先生行状》主此说。

以上诸说,孰是孰非?

让我们先来看“奉使封藩”的时间,关于这一点,吴伟业本人其实是有十分明确的记载的。他在七言律诗《感旧赠萧明府》的序中写道:

余年三十有一,以己卯七月,奉使封延津、孟津两王于禹州。^③

“己卯”为崇祯十二年,“禹州”为明代州名,辖境相当今河南禹县、密县地。“奉使封延津、孟津两王于禹州”指的正是“奉使封藩”之事。吴伟业的这段话毫不含糊地说明了“奉使封藩”是在崇祯十二年七月。考吴伟业一生,“奉使封藩”仅此一次,故决不应置于崇祯

九年之前,陈廷敬《吴梅村先生墓表》显然是把时间搞错了。

下面,再让我们考察一下“奉使封藩”与“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两件事孰先孰后。现在的研究文章一般都采用顾师轼和铃木虎雄的意见,即认为“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在先。而事实恰恰相反,应当是“奉使封藩”在先。这一点,吴伟业本人也有明白无误的记录:

吾去而封王豫中,(史)堃谋以成御史宝慈勇参武陵(指杨嗣昌。杨,武陵人)事主使坐吾,赖堃死而后免。既升南中少司成(即司业)甫三日,而黄石斋予杖信至。……

这段话见于《梅村家藏稿》卷五十七《与子曝疏》。疏中依循着时间顺序历历叙述了伟业一生的遭际,据上述引文,“奉使封藩”(“封王豫中”)确是在“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之前的。对此,我们还可以举出吴伟业的另一段话加以印证:

微臣受生尪瘠,善病虚羸,往年给侍殿廷,时忧陨越。奉使中州,在途忽闻臣母背疽危笃,焦心灼骨,昼夜兼程,抵家之日,幸而得救。外证虽痊,元神难复,从此臣母不离伏枕,而臣亦忧劳兼至,抱病困劣矣。为此投诚君父,拜表陈情,天地陶成,著于南雍供职,所冀讲授之暇,养身事亲,仰答生成。

这是吴伟业上给弘光朝廷的《升任请养疏》(见《梅村家藏稿》卷五十七)中的一段。其中,“南雍供职”云云,即指其“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事,在上述引文中,吴伟业回顾往昔,叙述了自己“抱病困劣”的由来:原来,他在往河南封藩(“奉使中州”)的途中,突然得知母亲病重,未及回朝廷报命,即昼夜兼程,返抵家中,他因忧劳交加也病倒了,于是向崇祯皇帝“拜表陈情”,获准改在南京国子监供职,以就近调养身体,侍奉母亲。上述一段话,不仅证实了“奉使封藩”确在“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之前,而且还告诉了我们吴伟业改任司业的具体原因。所以,在上面列举的关于吴伟业“奉使封藩”和“任南

京国子监司业”时间的三种说法中,以顾湄的《吴梅村先生行状》更为准确些,让我们把《行状》的有关记叙抄在下面:

己卯(崇祯十二年),銜命封延津、孟津两王于禹州,(史)堃谋以成御史勇事牵连坐先生,会堃死事寝。升南京国子监司业甫三日,而漳浦黄公道周论武陵夺情拜杖信至。先生遣太学生涂仲吉入都具饘。涂上书为漳浦讼冤,干上怒,严旨责问主使,先生几不免。庚辰(崇祯十三年),晋中允谕德。

这段记叙,第一,把“奉使封藩”系在了崇祯十二年,第二,把“任南京国子监司业”系在“奉使封藩”之后,这都是正确的。然而,细加审察,仍发现存在谬误,其误有三:

(一)它把“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事也系在了崇祯十二年,而实际上,则应在崇祯十三年,谈迁《国榷》卷九十七记载:

庚辰崇祯十三年,四月壬子朔,乙丑,……吴伟业为南京国子司业。

《国榷》中有关崇祯、弘光两朝的史实,系录自两朝之邸报,而其中部分邸报即直接得之吴伟业^④,谈迁是吴伟业的挚友,《国榷》这部书,吴伟业曾“多所裁订”^⑤,因此,上面的那条记载是绝对可靠的,从而可证《行状》之误。

(二)它把黄道周“拜杖”误认为是因为“论武陵夺情”。按“武陵”指杨嗣昌。可是,据《明史》卷二百五十五《黄道周传》、洪思《黄子年谱》和《国榷》卷九十六、卷九十七等等史料,道周论杨嗣昌“夺情”虽然曾触怒了崇祯帝,但并没有遭到廷杖的处分,而只是被贬谪江西,时间为崇祯十一年七月。道周“拜杖”实际在崇祯十三年八月,原因则是江西巡抚解学龙荐举他,犯了崇祯帝之大忌,结果,解学龙与黄道周“俱逮下狱”,“各杖八十”。

(三)它把“晋中允谕德”误系于崇祯十三年,其实,“晋中允”和

“晋谕德”是两回事，它们既不在崇祯十三年，也并不集中在同一年之中。这一点，下文将要谈到。

辨清了《行状》的谬误，我们就可以准确地判断吴伟业就任南京国子监司业的时间了。

《国榷》记载吴伟业被任命为司业是在崇祯十三年四月，不过，他实际就任则要晚一些。据吴伟业《与子曝疏》，他到南京就任司业的第三天，从北京传来了黄道周“拜杖”的消息。上面说过，道周“拜杖”是在崇祯十三年八月，从而可以推知伟业到南京就职当即在这一年的八月或稍后不久。

至于吴伟业离任的时间，《国榷》卷九十七也有明确记载，一条记着，崇祯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吴伟业被任命为左中允；还有一条记着，这一年七月一日，吴太冲继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可知，最迟到崇祯十四年的七月，吴伟业就不再担任司业了。

从崇祯十三年八月至十四年七月，吴伟业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共十一个月之久。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勾勒出吴伟业从“奉使封藩”到“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一段时期行迹的轮廓来了：崇祯十二年七月，他由北京奉命往河南禹州封延津、孟津二王，途中忽然得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封藩后未及返回朝廷，即昼夜兼程，赶回家中。母病虽稍愈，他却因忧劳交加而“抱病困劣矣”。为就近调养身体，奉养母亲，他上疏陈情，获准改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四月十四日被任命，八月顷才抵南京就职，一直到崇祯十四年七月离任，他担任司业大约十一个月左右。

二、崇祯朝最后三年之行迹考

吴伟业从崇祯十四年七月不再担任南京国子监司业时起，到

崇祯十七年三月崇祯政权垮台时止,这大约三年之中的行迹,以往的碑传年谱材料的记载,有不少错误。比如吴伟业升为左中允和左谕德的时间,顾湄的《吴梅村先生行状》和顾师轼、铃木虎雄的《吴梅村年谱》都断定是在崇祯十三年。可是,《国榷》却有如下两条记录:

辛巳崇祯十四年,六月乙巳朔,己巳,卫胤文、吴伟业为左右□□。(按见卷九十七,后二字原缺)

壬午崇祯十五年,四月庚子朔,乙卯,左中允吴伟业为左谕德兼侍讲。(按见卷九十八)

综合这两条记录,可知吴伟业于崇祯十四年六月升为左中允,崇祯十五年四月再升为左谕德。两件事都不在崇祯十三年。

关于吴伟业这三年的行迹,旧的碑传年谱材料除去存在如上的错误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缺点,就是语焉不详,阙略太多。比如,它们都记着这样一件事:甲申之变时,吴伟业正居家中,“闻信,悲号欲自缢”。可是,却没有任何一种材料明确地告诉我们,吴伟业究竟何时回到家中的,崇祯十四年到十六年间,他不是接连升为左中允、左谕德和左庶子吗?他究竟赴京就职没有?他是从不再担任司业起就隐居不仕了呢,还是先到朝廷任职,后来才归乡不出?而无论哪一种情况,其原因又是什么?我们知道,崇祯朝的最后三年,正是天下大乱的前夜,各种社会矛盾均已激化,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已呈白热化状态。在这种形势下,每个人的思想和政治态度都远较平常表现得更为鲜明。因此,关于这三年的行迹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以往的碑传年谱材料只是简单地标明吴伟业在这三年中官职的升迁,却不对上述那些重要问题做哪怕一点点说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失。

这里,就准备拾遗补阙,就上述问题作一番考证。

先说归隐的时间。据笔者考证,吴伟业从崇祯十四年七月不再担任南京国子监司业起,就隐居不仕了。他虽然在崇祯十四年至十六年间,接连升为左中允、左谕德、左庶子,可是,他都没有赴京任职。我们可以举出如下两条证据,第一,《梅村家藏稿》卷四十二《金宪梁公西韩先生墓志铭》云:

余与公定交于先朝,比去京师十五年,宿素已尽,惟公迎阁握手,高谈尽日。

“梁公”指梁维枢,“先朝”指崇祯朝。“比去京师十五年,宿素已尽,惟公迎阁握手,高谈尽日。”是写伟业应召仕清抵达北京后与梁重逢的情况。伟业抵京在顺治十一年春(说见下文),由此上推十五年,为崇祯十二年,可见,吴伟业从崇祯十二年离开北京后,一直到顺治十一年春,十五年内从未到过北京。那么,显然,他在崇祯朝最后三年也决没有到京去就任什么官职。第二,《梅村家藏稿》卷二十八《宋子建诗序》云:

往者余叨贰陪雍,云间宋子建偕其友来游大学。……子建至,则相与讲德论艺,命酒赋诗,极昼夜勿倦。盖山川之胜,文章之乐,生平所未有也。余既东还,子建被荐入翰林。无何,天下大乱。

“陪雍”指南京国子监,是相对北京国子监而言。“叨贰陪雍”为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之谦词。“余既东还”之“东还”指还乡,因伟业家乡太仓在南京之东。在上面一段话中,“余既东还”与“子建被荐入翰林”对举,说明伟业自南京返回太仓后,直到“甲申之变”前,一直隐居家中,并没有到过京城。

考证清楚归隐的时间后,让我们再来考察吴伟业归隐的动机。陈廷敬《吴梅村先生墓表》中有这样一段话:“……寻迁中允、谕德。丁嗣父艰,服除,会南中立君,登朝一月归。”“南中立君”指弘光朝